拉薩的最後一位喇嘛

「苯教」在西藏的復甦——一種導讀

〈拉薩的最後一個喇嘛〉敘述的是一個未來的預測，也是烏金噶瑪巴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出逃拉薩北郊的祖普寺以後，成為北京宗教局將「藏傳佛教」一舉趕出西藏的撒手鐧，以扶植沉寂千載的「苯教」在西藏的重新復甦與增生，但卻重演了婆羅門驅趕「原始印度佛教」出印度的歷史、又促使了泰耶噶瑪巴的「噶瑪噶舉」引領世界佛教發展的因緣。這是太錫度以「孔雀信」所策動的大寶法王認證餘波，而夏瑪巴卻只能以「噶瑪噶舉傳承」的純粹性規勸之。

我對〈拉薩的最後一個喇嘛〉一直有著偏愛，因為它雖然被我安排為本書的最後一篇，卻是我最先完成的篇章。不過我得先說一句，我寫〈拉薩的最後一個喇嘛〉的時候，達賴喇嘛正在臺灣，做有史以來的第一次訪問，但是我寫這篇小說的動機與達賴喇嘛的旋風式訪問沒有一丁點兒關係。這個一定要事先說明。小說裏面的喇嘛也不是影射他，這個我也得先順便帶上一筆。

有人告訴我，這是一篇奇怪的小說。我只能說這是因為他有所不知。這裏面其實有著一籮筐的近因與遠因。這些沒有關連的原因在這段時間裏將我的生活層層捆綁，於是我就創作了一個囚禁自我的窗口，然後從這麼一個囚禁的窗口望向未來的星辰，讓顛沛的思想直截回溯痛楚的生命，以令偶然形成的故事將自己解脫了出來；我可以這麼說，在緣起的觀照下，偶然並不是那麼地偶然，但必然的結果卻是絕對可以預期的，因為這麼一個偶然的種子竟然是建構這本書的微細因緣，所以後來當我將「臺北的星空」轉變為「拉薩的星空」，而開始創作〈拉薩的星空〉時，這個「自我囚禁的窗口」就成了我渲染「空、假」論說的「出口處」，或「入口處」。

說來已經很久遠了。我在構思〈拉薩的最後一個喇嘛〉之前，正看著大陸的電視連續劇〈宰相劉羅鍋〉。我本來是不看連續劇的，不過剛從大陸移民到洛杉磯的老婆要我看，我也就看了。雖然我

看了以後覺得馬馬虎虎，但劉羅鍋那副遊戲人間的模樣就成了我小說內的喇嘛形象。那個影像的疊印當然是一種「蒙太奇(montage)」似的影像，但「蒙太奇」的剪接藝術卻讓我轉接到了這裏，然後處理為一個銜接「過去與未來」的組合，藉以產生「過現未」單獨存在的時候所不具有的特定含義。

在構思的當時，國家主席江澤民正好訪問印度與尼泊爾，我隱隱地替藏傳佛教感到不妙；然後我開始寫了沒多久，那個說話不經大腦的國防部長遲浩田在訪美期間公然宣稱「六四」天安門廣場上沒死一個人。我當時揉了揉眼睛，想把這對曾經觀看過「六四」血幕的眼睛揉醒，但是愈揉愈糊塗，於是我就把他的跋扈封了個「司令遲鐵嘴」的官銜來個張冠李戴，然後將〈宰相劉羅鍋〉的歌詞改了一改，引為小說的序幕。這點，位高權重的遲浩田是奈我不得的。這些是近因。

這篇小說的遠因是我在不久前剛讀完義大利小說家卡爾維諾的〈恐龍〉，而因我一直對他描寫這個已經從地球上消殞的龐然怪獸歎為觀止，於是就悄悄地將這個手法借用了進來。更遠的原因是，我一直對西藏的「政教合一」的歷史有著尊崇，對共產黨看不見自己的腐敗，卻胡亂地給不聽話的人戴上「分裂祖國」或「反革命」的高帽子卻有著厭惡；另外，很多年以來，我就一直對他們染指純屬宗教的「活佛轉世」的認證感到不恥——不論他們用甚麼方式來解說，他們不懂宗教，不明白「轉世繼位」的深刻意涵，實在沒有任何理由插手，因此任何官方的認證都是一種宗教迫害與褻瀆。

我就是在這些因緣聚合之下，寫下了〈拉薩的最後一個喇嘛〉；其之所以名為「最後」，正是我由龐然怪獸的恐龍不敵歷史的摧殘而不得不消殞，連想到傳承了十幾個世紀的「活佛轉世」可能也躲不掉政治要脅、以及由其內部腐壞的宗教迫害。這個哀傷的氛圍始終濃膩不化，所以下筆時，自然無法對「藏傳佛教」的將來開朗起來。

這裏面當然還因為我想藉著這個方式表達我對我的老師夏瑪巴的感激。奇妙的是，我在文章裏不由自主地闡述語言之不可依，或許是我害怕自己有一天還得去學「藏文」罷。另外在寫作過程裏，我一直都有一個模模糊糊的意念，所以我就不自覺地順著筆觸，去尋找我自己將來的去處。

我在描述自己的歸宿時有著不可言說的淒涼。好像是這樣的感覺罷。起先是我對我的生命發展有一種荒謬的感覺，然後由荒謬想到當代「存在主義」大師卡繆，然後再想到希臘神話中的薛西弗斯肩上的巨石。我不以為卡繆的荒謬思維有出路，於是努力將薛西弗斯肩上的巨石捻碎，然後鋪成一條褐黃卵石子路；我卸下肩上的重擔後，開始漫無目的地踏上了卵石子路，漸漸地，石子路消失了，而代之而起的則是一條白雪紛飛的泥土路，然後我在這兒將整個《懷疑與恩寵的故事》畫上休止符。

這一段描述曾令廣東電視臺的沈憶秋導播激賞不已。她直說白髮自落與大雪紛飛疊印在一起是一個絕美的意象，她幾乎可以從這一段描述看見這一幕白色交融的景象在喜瑪拉雅山麓展演，但其實我這一段「絕美」的安排有幾重意義。

首先，巨石之於薛西弗斯實在是等於荒謬之於輪迴，因為不論我們鼓足多大的力量將巨石推至山頂，巨石必將滾下。這個意思是說我們在一個起了頭就停不下來的輪迴裏，只有兩個方法才能遏止這項徒勞無功的荒謬：倘若不能將山頂碾平成一塊足以容納巨石的平臺，那麼就得將巨石捻碎成小石子，摒住障礙，甚至幫助進階。當然建構山頂的平臺，對只能輪迴的我們來說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只有努力地將巨石捻碎，慢慢地在輪迴的生命裏積聚足夠的資糧，一步一步地爬著道階；我以為，也只有在這個時候，毛髮俱落才具任何意義。

如果讀者在〈拉薩的最後一個喇嘛〉僅讀到了一個臆想，那麼它詭譎的色彩就顯得有些蒼白；如果任何人只對小說的結構有興趣，那麼它藉情節擺脫文字羈絆的企圖就顯得有些自不量力。這些都還不算是最嚴重的。我害怕的是，有人連情節臆想與小說結構都沒看到，卻只見到文化、歷史、宗教與政治的糾葛，然後隨隨便便地誑言這是一篇帶有政治色彩的小說；面對這些有所為的人，我一方面想躲避他們，另一方面卻又覺得有很多話要說。

傳統的「藏傳佛教」在目前的西藏傳衍是岌岌可危的，其歷史上的處境頗為類似佛教在印度被驅趕的遭遇。我的看法是，倘若中國共產黨對拉薩的控管持續一、兩百年，或「無神論者」持續逼迫

喇嘛貫徹「愛國政策」、持續驅逐不合作的喇嘛出境，則不止香格里拉將變成紫禁城，巴爾廓街變成東單商場的情景也指日可待，「拉薩的最後一個喇嘛」最後不得不離境也是非常有可能的。這一天，小說所引喻的是西元二〇二九年，可能太快了一點，但西元二二二九年或許就不是那麼地不可能了。

正由於我對「藏傳佛教」或將面臨印度佛教的命運充滿了哀傷之情，所以我藉著〈拉薩的最後一個喇嘛〉闡述一個因緣聚合與一個精神感召，來探索一個延續人類精湛思想的可能性；更由於最後「藏傳佛教」只能在國外生根，所以我藉著〈拉薩的最後一個喇嘛〉對「藏文」流失的恐慌，來表達一種對人類語言支離破碎之感懷與一種對宇宙共有溝通工具之嚮往。

雖然〈拉薩的最後一個喇嘛〉因為批判了共產黨在西藏的行逕、而不可避免地有了政治色彩，但是其實我對政治沒有興趣，甚至我對宗教也不願多說，我只是藉著〈拉薩的最後一個喇嘛〉來表達一種時空交錯的宇宙生機與一種人佛共顯的解脫意識，所以它不應該屬於任何一種宗教，更無意超越宗教。我想這篇文章的最終極意義就是想說明，我們應該努力拋棄一切人為的概念以及自私的偏見；當然，這些概念與偏見包括擾人耳目的「宗教信仰」。

我不是在這兒散播「無神論」思想，我只是說，在這麼一個時空流轉的歷史過程裏，任何權威形象其實離不開眾生對時代的需求；宗教之所以成為宗教，典範之所以成為典範，或偶像之所以成為偶像，其實離眾生的心意外，別無存在的必要。從這個角度來說，任何人都可改變〈拉薩的最後一個喇嘛〉的外殼包裝，而以〈耶路薩冷的最後一個修道士〉或〈巴格達的最後一個聖戰烈士〉、〈北京的最後一個共產黨人〉或〈臺北的最後一個民主鬥士〉、〈錄音室的最後一個青春歌手〉或〈文學院的最後一個文學教授〉、〈史學院的最後一個編史者〉或〈哲學界的最後一個思想家〉等等不同形式的人物來重寫這篇小說，其理都是相通的。

我在文章中跟大家開了一個玩笑，因為認真說來，對一個躲藏在閣樓裏三十多年的六十歲老叟來說，似乎無論如何都不應該為一則人世間的報導所感動，所以那時的「我」有沒有下閣樓，都值得

懷疑。但是不論我是否下了樓，我在小閣樓對面的商場大樓裏盯著小閣樓的窗戶緬懷過去與等候出離的時刻，其實有著漂泊前最悲愴的涵義，因為我完全不知道下一站在哪兒，於是在期盼的祝願與告別中，我的心裏裹捲著哀傷的意緒。緊接下來的出走過程裏，其實隱涵著步驟，在逐步清理我的依戀與執著裏，使我有足夠的時間排除心理負擔，回復到在小閣樓的寧靜以便與自我對話。這些盪來晃去的徬徨與我在賦閒期間聆聽滴漏、構思小說的思維景觀有關。我衷心希望讀者能自行去發掘。

在此順便一提，小說中引用的西元二〇二九年是一樁我所無法理解的現起。它前後被我在不同的小說裏引用了三次。我估算了一下，西元二〇二九年我八十歲；我自己能不能活到八十歲，現在都仍屬未知，但它既然現起，我就捨不得讓它過去，所以我就將它用在小說裏。我是不懂「直觀」的，但我想這也是「直觀」的一種顯現罷。

最後說說我為何在《懷疑與恩寵的故事》裏引錄「易理」來詮釋「藏傳佛學」。這裏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藏傳佛教」廣為人所詬病的「雙修」，但是其實拋開修行的層面不說，這裏面的義理與《易經》以「六九」來論述卦象沒有不同。「六」為「易」之陰數，變於六，正於八，故從入從八，而「九」為陽之變，象其屈曲究盡之形；換句話說，將一對分別相背的「六九」正於其「變、不變」之間，就是「易」的「變易、不易、簡易」之理，是曰「陽之變為陰，陰之變為陽」。

伏羲在一個洪荒、無字無符的時代，以「一」立長爻，然後「擘一」為短爻，就跟盤古張目為晝、閉目為夜一樣，都屬於「不可說不可說」的領域。「一之長爻」或「擘一之短爻」均因事無形，故伏羲創意以指之而已。九之「陽之變」亦然，其屈曲究盡之形為「純體指事字」，不得再解構。

這麼一個「不可說不可說」的譬況之詞，用嚴謹的哲學術語來說，就是「本體論」，不止不可了解，而且本來就不可定名。伏羲以「一」立長爻以後，「現象」就出現了，不止可以了解，更可以定名，令「現象」與「本體」交互薰生，於是「宇宙」就在「本體、現象」互引互證的力度下，逐漸

形成一個「氣形質具」的概念，而「時空」隱然成形，然後「名身、句身、文身」開始於其間造作，來回於「現象、本體」兩界。這個「時空」用中國哲學思想的語彙來說，就是「天地」，與「宇宙」等義，而「現象、本體」互薰互生、互力互用，就形成了一個密不透風的語義系統，進了這個語境，一切情理均能彰顯，而出了這個語境，一切論說互生扞格。

這個不相容納的語義系統即《老子・第五章》所講的「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而如何統攝一個語義系統，令「現象」在詮釋「本體」的時候，上下求索，在「變易」中求其「周全」，又不違語義，就是「本體論」之意，也是伏羲以「一」定長爻、以「九」在「一」裏窮其源盡其妙的用意，是曰「一之變」，以「陰陽」尚未有名故。

「一(長爻)之變」既生，「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一、九」逐漸混為一說，於是就掉入了「名可名，非常名」的語境，所以老子接著說「多言數窮，不如守中。」這個「守中」在二千多年的詮釋裏，被解釋得天花亂墜，莫衷一是。其實不必如此，只要回溯伏羲以「一」立長爻、以「九」立「一(長爻)之變」的用心，朋從爾思，憧憧往來，就知「一、九」不方不隅、無偏無頗，是「守中」也，以「一、九」不一不異，不變不易，二而不二故。

只不過這麼一來，伏羲以「一」立長爻的造作就終止了，「現象、本體」也就再也論述不下去了。伏羲作為「三皇」之一的聖者，當然不能束手就擒，但也不忍，因為他明白他再造作下去，天下之論說將無盡無止，再也不得安寧，而天下所有能言善道的人士都將以之為論說之依據，所以在「做與不做」的猶豫之間，「幾者動之微」就被觸醒了，於是伏羲索性「擘一(長爻)」，以「短爻」伴隨「長爻」而傳世。這是老子所說的「聖人不仁，以百性為芻狗」的意思。這句話，千古傳誦，其中的解釋大多讓人不知所措，牽強附會的也就不去說了，很多甚至污蔑調侃。

其實說穿了這句話的重點在「芻狗」，但「芻」為何意？清代王筠的《文字蒙求》說，「芻，既刈之艸，包束之，艸分為兩而各包之，便於擔荷也，勹同包。」其所包而擔荷之艸，作「屮中」，

其之成兩者，以斤斷艸，變艸為「屮中」，以見其為已斷，是為古「折」字，「斮」也。伏羲「擘一(長爻)」為「短爻」，何其有異？「既刈之一(長爻)，包束之，一(長爻)分為兩(長爻與短爻)而各包之，便於擔荷也。」其所擔荷者，「狗」也，「刈一(長卦)」之同時，即「止以守之」，是曰「即動即止」。何以故？《說文解字》說「子曰，狗，叩也。叩氣吠以守。」叩者，觸也，叩氣者，出其氣也，狗出其氣者，吠也，即出以守，「止以守之」也，是以《易・說卦》曰，「艮為狗。」

這是「連山守艮」之因，也就是說，伏羲「擘一(長爻)」為「短爻」的時候，立即知曉「幾」的造作，但因「幾」不動則已，一動成「勢」，於是在順勢而造的同時，「止以守之」。這樣的詮釋如果不能入方家之眼，那麼我們來檢視《莊子・天運》的「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祭以將之。」尸祝者，祭祀官也，也就是說，莊子把「芻狗」當作「不可說不可說」的物象，所以在「未陳」之時，「盛以篋衍，巾以文繡」，一旦必須論述，則「齋祭以將之。」如果一定要將一個有形的「芻狗」說破，則「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爨者，《左傳・宣公十五年》有曰：「易子而食，析骸以爨。」杜預又注：「爨，炊也。」不可謂不慘烈。

既是如此不宜陳述「芻狗」，為何歷代學人均以「草紮成之狗，以為祭祀之用」大訴特訴呢？這個現象，老子早已有所警惕，所以先將其凸顯出來，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也就是說，「芻狗」的物象存在是一個渾綸的現象，只宜以事指之，如果以「萬物」之有形象之，則原本彌綸的「天地」將不再完整，是曰「天地不仁」。這也就是《老子・第五章》的「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的意思，但必須將之倒之、反之以釋之，否則不能了解「天地不仁」。

了解了這個，是了解「先天五太」之「太易(未見氣)」的基礎。但要注意的是，其之所以名為「太易」是因為伏羲始作「八卦」，並無「易」之名；換句話說，「連山」與「歸藏」不宜以「易」稱名，而學界習慣以「三易」稱「連山、歸藏、周易」其實是以「周易」為本位來看「連山、歸藏」的。這雖有其方便之處，但其實「周易」以六十四卦「周全其變易」不能論「連山、歸藏」的八卦，

因為從八卦到六十四卦，八卦的結構因「下三爻、上三爻」層疊為「六爻」，有了一個極大的拓展。這個在伏羲「擘一(長爻)」成「短爻」卻「即止」的立場說，不能不說是個「躁進」。

學界一般說，「周文王拘而演《周易》」，重八卦為六十四卦，並作「彖辭」，而後周公旦作「爻辭」，再然後，孔子「五十以學易」作《易傳》。明顯地，這一切造作均因「重卦」之造，而後有「易」，引起了思想上的混淆，所以必須加以佐證、澄清。但是這對「伏羲作八卦」的景況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萬物流出」的造作，就算以「易曰天地壹壹」來注解，其實「周易」已經「動而愈出」，再也回不去「歸藏」，遑論「連山」了。或許這就是「連山」與「歸藏」不能不從歷史裏消泯的原因罷。《易傳・繫辭上》說，「六爻之義，易以貢」，不是沒有原因的，因「六爻」出，「太初(氣之初)、太始(形之始)、太素(質之始)」急遽成形，然後「太極(氣形質具)」的觀念就形成了，再然後「太極圖」就發展出來了，雖然陰陽勾旋也自有渾淪一氣的意義，但是其實不見得就是「伏羲作八卦」的意圖，《易傳・繫辭上》又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邏輯思想大作矣。

這個當然是因為孔子為了深入演繹《易經》，必須以「邏輯性語言」來闡述「邏輯性思想」，而後才有了《易傳》，但是老子歸納《易經》，則不以「邏輯性語言」來闡述「邏輯性思想」。那麼《老子・第五章》為甚麼以這樣一個結構顯示呢?「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為甚麼要倒之、反之以釋之，才能了解「天地不仁」或「聖人不仁」?

這裏就牽涉到「能指、所指」與「名實論」的問題以及「句段關係、聯想關係」的問題。中土對這樣的問題比較含混。以《心經》來看「能指、所指」或「名實論」，則「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說的就是「名不異實，實不異名。名即是實，實即是名」，而「名」與「實」互薰互生，或「能指」與「所指」互力互用，乃至融會在一起。

以「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來看，那麼「萬物不異芻狗，芻狗不異萬物。萬物即是芻狗，芻狗即是萬物」，或以「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來看，則「百姓不異芻狗，芻狗不異百姓。百姓即是芻狗，芻狗即是百姓」。其「不仁」者，「能指、所指」順著「不異、不一」而整個交織起來，乃至「天地、聖人」、「百姓、萬物」混而為一。

這在中文象形字的「形音義」仍舊一體成形或中土的「形象語言」還未流失的時候，以「邏輯性語言」論述「邏輯性思想」甚至「非邏輯性思想」，還不至有太大的問題，但從漢武帝開拓西域、聲韻大肆傳入中土，或從劉向「廣陳虛事，多構偽辭」、「形象語言」流失以後，「中文表述」逐漸形成一種只有「音」的作用，中文的「形聲字」於焉大造，於是探索這一類的表述，甚為困難。如今要回溯至先秦時代的表述，當然不可能，但如果能夠就整體文字結構探索句段關係與聯想關係，那麼要了解先秦的思想還是有一線生機。

這裏借助西方的「結構主義」來做個解說。目前的「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被文學評論家引為論述、歸納「現代小說」的一種方法論，甚至被藝術評論人士引為「藝術表現」的一種方法，但其實最先可以追溯到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將語言視作一個系統，並發展出來「結構主義」，將語言系統相互關連、整齊有序的符號彼此連接、構成不同的語法和語義，簡單地說，就是將「能指、所指」與人類的說話行為結合為一，讓意識深處的語言結構與個別文化族羣所使用的語言記號、就其元素與法則在某一個特定的時間內，客觀地讓深層、「無意識結構的思想」去指引「有意識的說話行為」。

這個語言要素就是「能指」（signifer）與「所指」（signified）兩個符號，其關係猶如一個銅幣的兩面，「能指」是符號的顯性形象，「所指」則是符號的隱性意義，或謂之「概念」（concept or conceit）。「能指」與「所指」一起結合，才能成為一個完整的符號，譬如「芻狗」這個詞，當「芻狗」見諸筆墨時，一個以「草紮成之狗」的祭祀用品並沒有形成「所指」的印象，而當「以萬物

為芻狗」或「以百姓為芻狗」被聯想的時候，「能指」與「所指」才同時現形，易言之，當人們想到關於「芻狗」的「所指」時，「萬物」或「百姓」的「能指」亦同時被聯想出來。

這個就是「能指」與「所指」在心理的聯想作用，於是接下來，「能指」與「所指」可以任意結合，並不一定侷限於「萬物」或「百姓」，而可以是「物自身」或「眾有情」，只要這兩者可表達「差異性」。換句話說，「芻狗」這個詞沒有任何理由一定要與「萬物」或「百姓」共同指稱，而當「萬物」或「百姓」被指稱並與「芻狗」聯想起來的時候，他們心中所出現的已經是關於「天地」或「聖人」的概念。這就是「結構主義」的兩個重要原則——「任意性原則」和「差異性原則」，合稱「延異性原則」。學人經常有「以能為所」的困擾，也是這個「延異性」作祟的緣故。

這樣的「任意性」與「差異性」使得「能指」和「所指」的結合沒有固定和穩定的性質，有點像是約定俗成，但一旦「能指」和「所指」的結合被確定下來以後，「能指」和「所指」的關係就會固定下來，不會輕易改變，或「能指」和「所指」的結合具有一定的穩定性。至於「差異性」，由於整個語言系統的各個要素並不孤立存在，而是彼此互相關連，所以語言系統裏面的各個要素，其價值和意義就來自它們和其它要素之間的對立而獲得。

職是，當老子說「芻狗」的時候，作為「所指」的「芻狗」之所以有意義是因為「芻狗」不能以「有形之物」稱之，就像「萬物」、「百姓」、「天地」、「聖人」都不能以「有形之物」指稱，否則不能對等，而當人們言說「芻狗」時，「天地、聖人、萬物、百姓」四個要素就充當一個無形的背景，襯托出「芻狗」的意義。雖然人們在言說「芻狗」時不需要顧及、甚至忽略了上述四個要素的存在，但「芻狗」作為一個「名」的指涉，是不能忽略隱性的要素(「實」)，而單獨支持這個句子的言說。以「芻狗」為「所指」的這個句子，所有作為「能指」的「天地、聖人、萬物、百姓」等要素隨時都能夠和「芻狗」進行互換，這個句子仍然能夠講得通，譬如「天地不仁，以百姓為芻峋。聖人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也是合符邏輯的言說，而這種語詞和語詞之間的可互換性是謂「聯想」。至於

「天地、聖人」之所以被老子引為顯性的「能指」，則與「伏羲作八卦」有關，以伏羲為「聖人」，而「伏羲作八卦」則破了天地渾綸的原始狀態，故曰「不仁」。

這個解說當然也是一種「聯想」，只不過，「伏羲作八卦」屬於「不可說不可說」的「非邏輯語言」，所以《老子・第五章》才有了這麼一個對稱、有如詩句一般的句段，「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讓「能指」與「所指」之間進行組合，從而組成一個完整句子，但同時也服膺於「延異性原則」，讓「天地、聖人、萬物、百姓」整個交融在一起，然後論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這些論說在「藏傳佛教」裏是不可能論述的，但是吐蕃在西元六六三年滅了吐谷渾以後，卻被慕容鮮卑族從中土帶去的「易理」整個襲捲了雪域，又由於夾雜在「象雄、天竺、中土」之間的吐蕃文化層階不高，於是隨著蓮花生大師在當時的印度所引進的密法，就逐代發展出來了一個「雙修」的概念，肇因於印度瑜伽傳統中，濕婆（Shiva）神至高無上的地位，被視為瑜伽的創造者、偉大的瑜伽修行者，是瑜伽之神、舞蹈之神和毀滅之神，位列印度教三大主神（梵天 Brahma，創造之神；毗濕奴 Vishnu，保護神；濕婆 Shiva，毀滅神）之一，但在印度文化早期，濕婆神的地位並不突出，只是後來隨著時間的演進，祂才諸神中脫穎而出。由於佛教在印度逐漸式微，所以蓮花生大師受了捲土重來的印度教的影響，就將濕婆的形象引進了吐蕃，並且快速地融會並取代了「易理」的說法。

濕婆會跳一百零八種舞蹈，分為女性式的柔軟舞和男性式的剛健舞兩大類型。祂在歡樂與悲哀時都喜歡跳舞，或獨自、或與妻子一起跳。通常濕婆都是在火圈中起舞，頭髮向上飛揚，一隻腳踩著代表無知的侏儒，另一條腿和手在空中扭擺，其右手執鼓，象徵生命，左掌托著火焰，則象徵毀滅，所以在濕婆手中掌握了創造與毀滅兩種元素。舞蹈既象徵著濕婆的榮耀，也象徵著宇宙的永恆運動，而運動是濕婆為了使宇宙不朽。在一個舊時代結束時，他還會通過跳坦達瓦之舞來完成世界的毀滅，並使之回歸到宇宙精神中。這麼一來，濕婆就代表了「宇宙(cosmos)」，而與「伏羲」相同了。

不論這是否為張冠李戴，這種論說的確不是佛教的原始論說。這裏面有甚深的「入覆、冒進」意圖，但由於過於神祕，所以學人照單全收。這個現象，英國學者Richard Gombrich曾在一篇論文「How Buddhism Began」說過，「I think we can safely say that for about a thousand years, Buddhism in India was a religion which could be characterized as antithetical to Tantra, or at least to Saiva/Sakta tantra, which was the tantric religion par excellence. Firstly, Buddhism cultivated self-control in general…In a possessed person, normal self-control and self-awareness are totally surpressed…Secondly, Buddhism per se, being unconcerned with worldly matters, did not recognize brahminical concepts of impurity.」(p.163)

在此的「Saiva」就是「Shiva」，而「Sakta」則為「Saiva」的女神化身，「Saiva/Sakta」，這麼一來就成了一對不可分割的「創生與終成」的象徵，而與中土的「易理」相通了。這基本上就是「藏傳佛教」的「雙修」理論，深受「印度教」的影響，卻也是我亟力將之回歸於「易理」的企圖。說來不堪。西方學界詮釋「Saiva/Sakta」的學者很多，雖然一知半解，但是興緻很高，但對「伏羲」或「易理」的探索則很少。或許這是因為「Saiva/Sakta」的神祕色彩或「藏傳佛教」的絢麗奪目，但總是遺憾，所以在「藏傳佛教」被驅趕出西藏而「苯教」有復甦跡象的當世，我就覺得這是一個西方學界瞭解「易學」的契機，所以不揣簡陋，將「藏傳佛學」與「易理」在其內核義理上結合起來。

拉薩的最後一個喇嘛

我是個喇嘛。起碼我在小閣樓裏覺醒時是這麼認為的。

我對自己的身份重新覺醒的時候，隔壁的「網吧」正以一個超大型的電視螢幕將幾千里以外的訊息於瞬間傳送到了拉薩。他們都說這個就叫作「互聯網」，不止消弭了空間的隔閡，而且令所有的影視與圖片、文字與音韻都結合了起來，所以「電話、電視、電腦」如今都成了歷史名詞，而偏遠的拉薩在這波電訊的衝擊下，也不再具有地理上的偏遠意義了，甚至還像是為了彌補往日的陌生似地，刻意地展現了一個比中土一些城市還要親近北京的態度。

照理說，街道的變化影響不了我，而躲在八角街一隅的小閣樓更是幽靜，但這個電視螢幕實在是太大了，而且那個高八度的聲調更是日夜不停地對著大昭寺前的膜拜羣眾放誦著風迷了北京的流行歌曲：「中國東南有寶島，那島民是老花俏，彈丸地呀浮呀浮海峽，你就是那渡海面的鵝……」這是一首在全國反覆地播演了半年的電視連續劇主題曲。連續劇雖然已經下片兩個多月了，但是舉國上下仍是翻騰地慶賀著中國的統一。這時是西元二〇二九年，春天快到盡頭的時候。

我不想聽，但不聽卻不行。那個歡樂的聲調一直縈迴在小閣樓裏。諷刺的是，我在這個聲調裏發覺自己已經不再只是一個普通的僧人了。當然我並不是說我有了甚麼長進，而只是因為我的年歲讓我德高望重起來，稀裏糊塗地成了一個沒有「格西」證書的喇嘛。

這個身份的覺醒來得很輕忽，幾乎是在心裏毫無防備的狀態下突然就開展了出來。那種感覺說不清楚，好像一種失而復得的喜悅，但是維持不了多久，歡愉的心境立刻又頹喪下去，因為這一年的晚春初夏之際，環繞拉薩四面的山巒有著前所未有的光禿景象。

不止山巒光禿了，拉薩街頭也有著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我在小閣樓裏看不見。我只能從這首「司令遲鐵嘴」的歌詞，暗忖著偏安一隅八十年的臺灣終於也被解放了。當然這時的中國，與西藏被解放時的西元一九五九年，不可同日而語，不止國內富裕繁榮，而且海域清平穩定，從東海到南海，四處都可看見中國的艦艇與美國、日本的軍艦結合成了共同維護太平洋航行自由的「聯合艦隊」。

這多麼不可思議呀。但是據說這是因為中國的「一帶一路」策略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從西遏阻了「東突厥恐怖組織」在新疆的擴張，從東則瓦解了「太平洋警察」在南海的挑釁，而在一個更廣大的聯盟利益下，美國與日本就默許中國和平解放臺灣。據說位於北京的中央製片廠為了慶賀全國統一後的第一個「十、一」，特別趕著在天安門廣場的慶典裏宣佈，當晚將首映這部電視連續劇；還據說全片所用的背景都是跟著「人民解放軍」在臺灣的登陸與推進，實地拍攝了記錄影片而剪輯而成的。

年代已經相當久遠了。這一段時間裏，拉薩已經沒有多少人誦經了，當然這不包括我在內。我獃會兒還會作詳細的說明。這個改變其實不難明白。已有三十年了罷，我不止一次懷疑自己的身份。因為我好似在一夕之間，發現拉薩街頭的人都說著漢語。我那份驚訝就別提有多臊人了。但是你不要多心，我並不是在告訴你，我對自己不能流利地說漢語有著遺憾；我只是想告訴你，我絕不後悔自己是個西藏人，而且還是個出家人。

我生來就是個僧人。我不知道自己如果不是僧人，現在會是一個甚麼模樣。但是因為我從小就是個僧人，所以從來也不去想這個擾人的問題。在拉薩身為一個僧人，意味著生生世世維繫著佛陀的真理，代表著佛陀一脈相傳的最後希望。當然人們尊敬我，向我膜拜頂禮，不是因為我長成的模樣，而是因為大家對佛陀教誨的感激。這點你千萬不要弄錯。

當然我這兒所說的頂禮與膜拜指的是以前的景象。現在可不同了。這個處處受人尊敬的情形，自從拉薩街道上出現了一批又一批的漢人以後就開始有了轉變。我知道人們有著顧忌，但是我還是弄不明白，為甚麼他們看到我的褐黃色僧袍就像躲著瘟疫似地四下逃逸。唉。唉。我不知道我應該如何從一個自我封閉的囿限裏來向你述說這個模糊的歷史過程。倘若我說得辭不達意，你一定要原諒我。畢竟對一個老邁又不幸喪失部份記憶的僧人來講，回憶是一件相當殘酷的折磨，縱使我是如此努力地將記憶裏的事件壓縮至一個文字能夠清楚敘述的程度，但是文字老是自顧自地生出文字上的記憶。

大概就是在那個時候罷。當那位北京政府挑選出來的十一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杰布——還只是一個七歲男童的時候，前任國家主席江澤民與好幾任以前的印度總理夏馬在新德里簽署了一項四十年來第一次的宣言。這以後的事情就發展得有點令人吃驚。可不是嗎？忽敵忽友的國際紛爭在我這個不問世事的喇嘛看來都是荒謬可笑的。不過，這項簽署我相當注意，因為我知道它將對西藏有著深遠的影響。當然這個影響對西藏來說是不好的，但是對按著計劃大量移民西藏的北京政權來說，這無疑是一項歷史性的突破。喏，我這可不是有意詆毀北京。你只要想想，當年英格蘭有計劃地將囚犯大量移民至北美洲而造就了今日美國的繁榮，你就知道我實在是在恭維北京的高瞻遠矚。

不止這樣，印度在這個史無前例的外交折衝中，撿了個大便宜，因為在簽署了公約往後的三十年裏，困擾兩國多年的「中印」邊境也沉寂了下來；回教的巴基斯坦在沒有了中國的核子彈頭支援，終於也臣服於印度教的威權下，於是在四面邊境無戰事的情況下，印度開始享受釋迦牟尼佛涅槃以來的第一個太平盛世。當然，你如果去問任何一個印度人，他絕不會承認這跟釋迦牟尼佛有絲毫關連，因為你知道的，印度現在只信仰以「大梵天」為唯一真神的「印度教」。本來他們感念釋迦牟尼佛的恩德，也曾經對流亡印度的達賴喇嘛表達了同袍的關懷。但是誰也沒料到，他們竟只是以伸出人道的援手來牽絆中國，藉以達成他們自己的政治目的；所以機會一來，他們首先就犧牲掉達賴喇嘛。

簽署條約那一年我三十六歲，正在研讀「現觀莊嚴論」。當我用短波收聽到簽約的消息時，我立刻有了警覺。也不知為甚麼，我的直覺告訴我，這次的簽署對西藏多災多難的宗教傳承是在劫難逃了。當然我作為一個拉薩的僧人，對國際事務的敏銳觀察力可說相當突出，因為事後證明我的判斷力極為正確。當然這與祖普寺的佛學教育無關，甚至與黨委書記推動的「愛國教育」亦無關。

我真的很不願意去回憶那個共產黨以「反分裂」為名大肆拘捕僧人的年代，因為我每回想起來就不知道自己做得對不對。或許這是因為我多年以來徘徊於祖普寺與大昭寺之間的烙印已經令我心驚膽顫，所以我一聽到簽約的消息，不加思索就慌忽忽地把尊貴的僧袍往山溝裏一丟，然後躲到我孀居了十多年的姊姊的小閣樓裏。不料這一躲就是三十多年。我當時完全沒有料到我真的能輕易地逃脫了厄運。嘿嘿。世事難料呀。如今我的頭髮長得比一般人還長、還白，連個絡腮鬍子也不敢剃，以至於四處張盤得好似野人一樣。

小閣樓的日子與天地等長，時間對我來說全無意義。只不過長時間的隔離還是令我的身體起了衰弱不堪的反應，而且隨著「藏文」的消失，當初慶賀自己死裏逃生的興奮也跟著平息了下來，於是我逐漸有了後悔之念。想來這是因為我在天長地久的思索裏，找不到一個可以溝通的對象，以至於令自己時常懊惱當初不能與其他的人一般慷慨就義。

往事真是不堪回首呀。我本來也不想再去說它了，但是我看到了事後一些奇奇怪怪的發展，又不得不蹙著眉頭去回憶一些真實的經過。唉唉，這件大收捕的事件過後，有好長一段日子，拉薩街頭看不到僧人。這樣本來也就清靜了，但是往後的一些歷史學者、西藏專家或宗教理論家常在各處集會裏多次批評我們當時四處藏匿的僧人。他們還自以為是地給了我們一個「頹敗精神的象徵」的稱號。他們總認為我們這種棄家背祖的逃亡就是一種沒有根柢的沒落表現，然後他們就以佛法的「因果律」來解說或批判我們這羣僧人的錯誤與背叛。我不知道他們說得對不對，不過從「解放日報」的報導來看，我們這樣四處躲藏了起來，的確有辱佛陀當年「捨身救虎」等等偉大行逕。

「解放日報」的報導非常慷慨激昂，常常在有限的篇幅裏大肆數說著我們的缺失。這些苛刻的批評總是令人回憶起「文化大革命」的恐懼，卻也在難以忍受的孤寂裏替我傳遞了許多同修的訊息。雖然混亂的時局導致人心浮躁，不過我可從來沒見到我的同修們有這麼多奇奇怪怪的疙瘩。

小閣樓的樓下是我姊姊的店舖。姊姊年紀輕輕就成了寡婦，雖然左鄰右舍都熱絡地替她物色新對象，但不料她成天只是誦著六字大明咒，從無蘸俗再嫁的念頭。雖然拉薩不是一個高消費的地區，但是基本的生活仍是需要的，於是她就將姊夫去世後所遺留下來的書店盤給了另一家書店。雖然每天進出書店的人很複雜，但反而沒有引起軍警公安的注意。這不能不說是護法的庇佑。

閣樓上的窗戶小小的，縮在一片櫛比鱗次的斜傾瓦礫後面。從窗檯看出去看不到街頭，但卻可感覺尖銳的哨聲與軍警的吆喝逐漸取代了圍繞著八角街的誦咒聲，偶而還能聽見遠處傳來的槍聲，讓棲息於瓦礫上的護法騷亂了起來。這些年的拉薩，風格外地大；外面颳著風，小窗子就吁吁地響著。我透過小小的四方天空，可以看到偶而有一、兩片樹葉不情願地颳了進來。除非是下雨，我都寧可讓小小的窗戶被吹得噼啪作響也不願關起來。其實這麼說也不盡全對，我喜歡在下雨時憑窗遠眺灰濛濛的天空，以及觀看著漫天雨珠在瓦片上四濺跳躍著。當然開著窗飄雨，使得小閣樓的地板濕漉漉地，這就少不了被姊姊責怪，但是這是我蟄居在閣樓裏最大的享受。這點她至死都無法瞭解。

從小窗口看出去，我雖然看不到街口，但隱隱地可以看見拉薩人的驕傲——布達拉宮。可惜的是，現在已經看不見了，聳立在眼前的是四層樓高的百貨大樓；白天在陽光的照耀，晚上則在霓虹燈的閃爍，金光閃閃的玻璃使得我的小窗口永遠都閃動著陰影。陰影裏，拉薩的新主人們以漢人獨特的侵蝕方法在四處破舊的房舍裏進行著昏天黑地的整頓與改進計劃。他們叫這個為「經濟開發」，於是一棟又一棟嶄新的大樓如雨後春筍般地在狹窄的拉薩街道被建了起來。

小閣樓的牆壁上塗著廉價白漆，一到炙熱的夏天就散發出陣陣嗆鼻的氣味；白漆太薄，於是在牆角掀起一個個氣泡，一摳就破個大洞，露出了原木的棗褐色，在透過窗戶的陽光裏躲躲藏藏。一到

夜晚，閣樓裏經常瀰漫著濃郁的藏香薰燒味，絲絲裊裊地散佈在一盞二十五瓦的昏黃燈光裏。小風扇在夏天裏通常都是整夜嗡嗡地轉著，它總是轉到一頭就很勉強地轉回來，嘰嘰地叫著，吹得電燈搖搖晃晃，令我頭昏。所以在炎熱的夏天夜晚裏，我大多不開燈，於是常渾渾噩噩地無覺於時間的消逝。在不開燈的時日，我就在黑暗中睜大眼睛瞧著天花板，豎起耳朵傾聽樓頂上夜貓的輕捷腳步聲與喵喵的叫聲。有時從窗檯望出去，在黑黝黝的瓦片上會看到兩隻暗綠色的貓眼，閃閃爍爍地，像極了墳堆裏的光瑩。這時我總是聯想到「空行母」幾劫以來就這麼棲息在拉薩城裏。

一開始時，我躲在閣樓裏相當地徬徨又不安份；給姊姊訓誡了幾次後，我在炙悶的閣樓中終於總結出對生活的無可適從，於是就雙手顫抖地從箱底找出泰耶噶瑪巴與夏瑪巴的照片細細端詳，然後感歎昔日的努力已經隨著「中印」簽署的條約而付之東流。

唉，真是無奈呀，我發覺我已經遭外面的世界徹底拋棄了，但從窗戶外飄進的熱鬧與嘈雜裏，我逐漸體會拉薩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變化；雖然我對外面的世界無動於衷，但仍不免哀悼維繫著西藏人團結的那份對達賴喇嘛的尊崇是如此地短暫與脆弱。我每當想起這些，四周就充滿著垂死的氣息，以至於我始終無法去回憶一九九七年共產黨利用香港回歸中國，在世界上所造成的政治與經濟震盪的具體過程。多少年來，我已經習慣將所有悲劇的起因歸結於「中印條約」的締結。

我在小閣樓數著日子。除此而外，我別無它事可作。我從一疊疊的「解放日報」知道現在已經是二〇二九年了。當然這三十年來，我的漢語可說是無師自通。這不是因為我諂媚、討好漢人，而是倘若我不學漢語，恐怕連這個唯一與外界溝通的訊息也將斷掉。

當然我永遠待在閣樓裏總是不行的。有一天，當我吃著糌粑時，我看到了「解放日報」刊登著一則新聞報導。消息很平淡，我卻全身都顫抖起來。報導上說，有一名「中國語言學會」的蒙古語文專家指出，兩千多年前活躍於中國北方的匈奴民族曾有過自己的文字。這篇論文還長篇大套地引述著一些蒐集、整理出來的匈奴文字，以考據匈奴輝煌的文字歷史，以及證實匈奴文字符號與中國甲骨文

的前身和吐火羅文相似之處。我看著看著，不禁想著「藏文」的流失，忽然唉唉地哭得好不傷心。第二天，我把姊姊生前給我做的最後一件藏袍從櫃子裏找出穿上，頭也不回地就下了閣樓。

我下了樓，走過對街，回頭看看書店，卻只見書店夾在一片低矮破舊的古老建築物中，一點都不顯眼。從街頭看上去，我竟然看不到小閣樓的窗子。我有些焦急，於是走進鄰近的百貨大樓，上了二樓，四處尋找小閣樓的影子，最後從一位售貨員的背後看到了小閣樓的窗戶。小窗口像個鴿子籠。兩扇窄小的木頭窗戶隨隨便便地搭在暗灰色的木板樓壁上，就像兩只附著在鴿子籠上的把手。

我盯著看了許久，終於引來售貨員的質詢：「喂！你看甚麼，這麼出神？」我驚了一下，轉身要走，忽然就看見有人影在小閣樓的窗戶裏閃動。我知道那個不知所措的身影就是我自己。那絕不是幻覺，而是一種現實的顯現，畢竟我在裏面窩居了三十多年。

我下了樓以後，在一塊招徠西方觀光客的英文招牌下，茫然地看著狹窄的石子路面上坑坑窪窪的積水，耳邊卻響著「司令遲鐵嘴」的轟天價響。積水被大樓的玻璃反映出一棱棱明晃的光芒，此時路邊走來一羣喇嘛，一腳高一腳低地踩得水花四濺，藍色的水珠隨即迅速地帶起五顏六色的彩虹。

我快速地加入了腳步零亂的他們。沒有誰阻攔我，這或許是因為我有著一頭銀白色的頭髮罷。我隨著他們走了一段路，卻不知他們就這樣將我帶離了小閣樓的街道。我有些驚訝周遭環境的陌生，但又覺得藏人已從幾世紀來的文化陰影走出，更習慣了「改革開放」所帶給藏族社會的繁榮與進步。

「好嗎？」我思忖著，用不怎麼流利的漢語與隊伍中的喇嘛聊著。

「好哩！」他對我親暱的態度顯然地嚇了一跳。「不就是那麼一回事唄。」

「都唸些甚麼經？」

「甚麼都唸。」他猛地仰著頭，瞪大了眼睛。「甚麼經不都一樣嗎？」

「作法事吧？」

「作！怎能不作呢？」他低下頭去摸著肩上的背包，調侃地加了一句：「不然沒事做也怪難受的。」他說這話時，頭壓得低低地，好像只是為了細數腳下的步履，但我卻看出來，他沒有喇嘛應有的篤定與信心，以至於那隻伸出去調整背包的胳膊看起來就像一只伸向歷史冤屈的枝椏。

路邊的羣眾不再像以前一樣對著我們膜拜，他們大都採取了迴避的態度；有那麼一、兩個膽大的居然對著我怒目相望。我一時不解，看看他們，又望望跟我交談的喇嘛。隊伍前方另一位喇嘛於是轉頭過來叫我走遠一些。我有些茫然，看來我的詢問使得喇嘛們感到惶悚不安。他的吆喝聲令我不得不走，但我又迫不及待地希望能重溫一下以前繞街的經歷。

「你趕緊走罷！」他索性放下了背包，在胸前調整著背帶。「在拉薩城的苯教子弟不希望看到我們像以前那樣繞街，妖惑羣眾。」

「嘿！」我嗤之以鼻。「苯教？哪輪得到他們來發號施令？」

「我瞧您久不知世事了罷！」他對我的輕蔑態度頗不以為然。「當心你這麼說要惹禍的。現在的拉薩城裏，遍佈著苯教子弟，以往的『格魯、噶舉、寧瑪、薩迦』早就四分五裂了。」

我嚇了一跳。「這怎麼回事？以往的『四大教派』都到哪兒去了？」

「早就七零八落，不見氣候啦！」他看著我身上的藏袍。「我看您像是舊社會的『藏傳佛教』子弟，不會不知道『噶瑪巴』鬧雙包罷？」

「我怎能不知？想當年，不是因為我對我的上師夏瑪巴展現了過度的親暱，我也不至於被驅趕出祖普寺，但是我聽說倆位噶瑪巴互不侵犯，一位在政治上接替了達賴喇嘛，另一位在宗教上延續了『噶瑪噶舉』的正統傳承。」我有意展現我在宗教傳承上的老資格，還特別加重了夏瑪巴與我的親暱關係。「只不過，我因為四處流浪，所以對十五世夏瑪巴的轉世認證不怎麼瞭解。」

「不就是那麼一回事唄。」他指著自己。「誰又不是在流浪呢！達賴喇嘛終止轉世以後，我們的『格魯派』勢力也就一蹶不振了。烏金噶瑪巴還是很爭氣的，承襲了達賴喇嘛的政治勢力以後，把

整個『藏傳佛教』經營得有聲有色，不止壓抑了年輕世代爭取『西藏獨立』的躁動，而且推動了西藏流亡族羣的『精神統一』。那可是達賴喇嘛逃到印度以來，難得一見的團結景象。」

「那你怎麼說苯教取代了『四大教派』呢！」

他緊緊盯著我。「這你就不知道了罷。」我搖搖頭，卻見他回頭瞧著領隊的喇嘛，壓低嗓音。「達賴喇嘛還在世的時候，就亟力將『四大教派』回溯至『古寧瑪學派』，以便消弭『四大教派』因修行方式的不同而不能達到『精神統一』的團結，而營造了一個『佛苯未分』的彌綸景象。達賴喇嘛用心良苦呀！他洞悉中國共產黨早已放棄長久以來都沒有進展的政治協商，準備以『噶瑪巴』來取代『達賴、班禪』的固有政治模式，所以大力介入『十七世噶瑪巴』的認證；雙方都接受的烏金噶瑪巴原本在祖普寺也相安無事，不料他卻逃離了拉薩，所以中國共產黨改弦易轍，索性連『噶瑪巴』一起放棄，並乾脆整個改變傳統上的『四大教派』輪替，釜底抽薪，去營建一個扶植苯教復甦的條件，更有人說，這根本就是北京宗教局所研擬的全本『捉放曹』戲碼在拉薩的通力演出，否則烏金噶瑪巴哪有可能在中國共產黨的眼皮底下，那麼容易就逃到印度去？」

「可不！」我依稀記得烏金噶瑪巴投奔達賴喇嘛的時候，在世界的政治折衝上造成了一股不小的騷動。「已有三十年了罷。我記得那時是西元一九九九年的十二月。」

「是呀！現在情況比較明朗了。烏金噶瑪巴在印度成功地統理了西藏流亡政府，而中國共產黨則在拉薩成功地將苯教重新扶植為一個統理『佛苯』的政治勢力。」

「這真不能不說是個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政治氣氛！」我為我自己的言語嚇了一跳。「只不過，原來的『喇嘛』就絕跡了，起碼原來的『四大教派』所定義的『喇嘛』在拉薩就再也找不到了。」

「嘿！」他對我擠了擠眼。「大家都說這與『印度佛教』在印度絕跡是同一個理。你瞧我們的領隊雖是個『喇嘛』，但卻是個『無神論者』，不止領著薪俸，有著官銜，家裏還有妻小呢！」

「是這個理。我想我還是得想個法子，趕緊到印度找著夏瑪巴，不然真見不著『喇嘛』了。」

我在大昭寺門前的中心廣場與他們分了手，然後一直往前走，直到再也看不到大昭寺以及兩旁新舊毗鄰的建築物時才停下了腳步。我突然笑了起來。我直覺地感到我與這一羣穿著僧袍的人不同。我在路旁情不自禁地狂笑，不知竟引來了路人的側目。但是我真的止不住呀。哈，哈，真的喇嘛穿著老百姓的藏袍，假的喇嘛倒正經八百地穿著僧袍。這可不就是魚目混珠嘛。

終於我的眼角沁出了淚水，於是像個小孩子一般地就哭了起來。路人搖了搖頭，見這整個事件不大有趣就各自散去。我慢慢停息了下來之後，無由來地感到一陣輕鬆。我不知道這三十年裏，世間是否已是真假不分，但我這個「拉薩的最後一個喇嘛」感覺到假的已經成真，真的倒像變成假的了。唉，唉，其實在「緣起性空」的觀照下，這其間還真是沒有甚麼不同。

我望著周邊的景物，發現一排排的子彈孔嵌鑲在古木參天的院牆上，一時不知該如何去想像。我想回祖普寺，雖然祖普寺已經變得印象模糊又遙不可及了。想著想著。忽然我聽見狂風吹著大樹，簌簌蕭蕭地；我用心地想著書店樓上的小閣樓，想著姊姊的臉，但是剎那間竟然甚麼也想不起來，我此時不由來地感到一種真正的孤單與恐懼，於是我轉身往尼泊爾的方向走去。這個時候，天空高遠而清澈，而我卻因周遭環境的改變，莫名其妙地想起「恐龍」因為不能隨著地球的環境改變而滅絕。

我心裏不再懼怕。上次藏匿時，我害怕我的身體受到傷害；這次的出走，我卻只擔憂我不能替「藏文」留下些記錄。街道上忽然人跡稀少，陽光也變得稀薄起來。我站在拉薩河邊觀看了一會兒，朦朦地只見遠處的囚犯一個挨著一個地走出納金電站勞改營。我暗歎一聲，然後舉步跨過拉薩河。我一邊想著如何去尋找舊識，一邊思索著如何效法瑪爾巴，在最短的時日將「藏文」作一有系統的整理與保留。我攫住模糊的思想，不太注意周邊的景物，直到我發覺我站在一片崇石峻嶺之邊。

雖然我不必太費心思去想，我就知道這就是達賴喇嘛、大寶法王與千千萬萬的拉薩人陸續奔往印度的道路。但世界顯著地變樣了，這山脈、這河流、這樹木與我聽聞來的竟然有著明顯的差異。我

不知這是否因為雅魯藏布江改道的緣故。嗯，這是件極有可能的事，因為當我仍蟄居小閣樓的時候，我就曾感歎雅魯藏布江終於在共產黨的堅持下改道了。「解放日報」上說，這有若千萬噸炸藥威力的核子引爆，將亙古以來的怒濤狂水導引到了南疆，灌溉了乾涸荒蕪的田園，以配合扶貧濟貧的政策來安撫騷亂的維吾爾族人，更一舉讓飽受恆河乾涸威脅的印度更改了他們一貫支持達賴喇嘛的態度。

我猶豫了一陣，但卻從鄰近的探頭縮腦裏確定了這條康莊大道，於是我躲藏起來，耐心地等著月黑風高的夜晚。當晚月色朦朧，我就大膽地上路了。此時四周的空氣出奇地沉澱，不知名的鳥兒在遠處淒厲地叫著替我送行。暗卡雖然仍是存在，不過大多外張內弛。我遠遠地從藏身的稀疏草叢中，瞧見他們藉著斑駁燈火煮著夜宵，我就知道他們關心他們的肚皮比關心我的出走來得深切多了。其實這幾年來已經不大有人出走了。拉薩一片歌舞昇平，年輕人都沉醉於物質的麻痺，只把「達賴喇嘛」當成古老的神話，更把「藏文」當作禁忌的圖騰。

我在小閣樓上聽得多了。就算沒聽說過，躲避這些暗哨就如同藏人吃糌粑一樣地自然，於是我趁著闃黑無影，一溜煙似地越過了警戒線。這時山溝裏的流水浮著一片淺藍，照耀著西元一九五九年達賴喇嘛夜奔的倉皇，也輝映著西元一九九九年烏金噶瑪巴逃離拉薩的從容。

我在山區裏走了二十幾天。好像也不怎麼費事，我總是在適當的時候找到一些野果充饑。大概護法也看到了我的堅苦罷。山裏冷熱適中，山峯上卻仍是銀光熠熠；光潔沁涼的雪水雖然可口，卻再怎樣也洗滌不去我眉間的炙烙。喜馬拉雅山還是歧嶇險惡。我在罕無人煙的曲澗洞壑裏依附著我飄散的記憶，在荒漠優雅的嶙峋怪石裏勾繪著我悒鬱的輪廓，然後在乍開還閤的花顏滴豔裏解析著我遺忘的徽記。我搜索著空曠，觸動著夢幻。歷史的「倉皇夜奔」似乎與「飄逸從容」疊印了起來，而現實的懸浮孤立卻又好似聽著了「藏文」消逝的嘈雜紛亂。

我孤獨慣了，所以一個人踽踽而行不是甚麼了不得的事。但是我憂煩極了，因為據說在印度的西藏人已經不見了。想來印度人驅趕藏傳佛教，就像當初婆羅門教驅趕佛教一般地果決。沒有人知道

他們去了哪兒，好似在一夕之間，他們就從地球的表殼消失，像股輕煙般地飄進了空氣裏。有人說，出走的藏人都在美國科羅拉多州的空軍基地接受跳傘與野外求生等軍事訓練，又有人說，他們在維吉尼亞州的山陵地區接受禪修訓練。我半信半疑，這幾十萬人不可能毫無痕跡地就消失掉了。我深怕我此行找不到舊識，因此心中老是七上八下。

我不知道走了多久，反正一路都找不到我要找的人，一直到我看見一長排的貨車排在甘托克的街道上，我才知道我已渡過了國境，進入錫金。我繼續走著。後來我終於遠遠地望見倚山憑險的隆德寺。我不想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於是繞道而行，因為大寶法王十六世圓寂後，我聽到過很多陰謀篡奪隆德寺的故事，但繪聲繪影的暴力描述，總讓我覺得這裏面有哪個地方出了差錯。

遠囉，遠囉，好像是亙古洪荒的事兒了。大概是西元一九九五年罷。那年太錫度藉著中國共產黨的勢力將隆德寺與大寶法王身邊的喇嘛一網打盡。事情有些黏黏糊糊地，我所蒐集的資料在共產黨的消息封鎖裏大都殘缺不全；但是我抱著一個想法，百無一失，那就是只要是共產黨要我相信的，我就認定另外一方才有著真理，於是當我在祖普寺忽然聽聞大寶法王十六世病故，然後蔣貢康楚仁波切意外車禍，接著太錫度就發表了大寶法王十七世的認定，我就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但我也不敢多說甚麼，只是從黨委書記手中接過烏金噶瑪巴的照片，默默地供奉了起來。

嗯，嗯。事情是這樣的，祖普寺是西藏有名的寺院，歷來都屬於噶瑪巴的駐錫寺廟，所以噶瑪巴十六世圓寂以後，黨委書記就指示眾人，將烏金噶瑪巴的照片供奉在大雄寶殿上；仍是孩童的烏金噶瑪巴並不在寺內，他正受著北京的嚴密保護中。他的情形與七歲的十一世班禪一樣。

我始終弄不明白，共產黨監控森嚴，卻又憂心忡忡地認為他們一回拉薩就會被極端份子暗殺。雖然他們一直沒有說明這些極端份子是誰，但是我們都知道，他們所指的其實就是像我一樣的僧人。活佛無法回來主持慶典是有點遺憾，不過反正那時的西藏慶典都不在拉薩舉行，所以「北京宗教局」這麼作，也就有著他們認可的方便，免得活佛旅途奔波而誤了政治學習與「唯物」教育。

我多年來就這樣地抱著存疑的想法，但是在祖普寺並沒有多大的作為。當然這個懷疑的心理令我在做大禮拜時，心裏總有著那種說不出來的幾分不自在。在小閣樓裏，我逐漸地將「解放日報」的消息整理出來，然後以一種反證的方式在新聞報導的字裏行間找到了真正的「噶瑪噶舉」傳承，以及找到了證據來證明太錫度多年來受著共產黨的控制。我當然不敢對任何人說，不過我非常盼望有一天我能聽到另一位大寶法王的弟子——我的皈依師夏瑪巴，對我親口說出他的疑慮，當然對他不遺餘力地維繫著「噶瑪噶舉」的傳承所遭受的污蔑與侮辱，我也將說聲抱歉與安慰之類的話。

唉，唉。世間的事兒很難定論。班禪十世當初與北京虛與委蛇，或許只是藉此以保存達賴喇嘛在海外流亡的一線生機罷。就算班禪曾經有過貪圖名利地位的世俗之心，我真的很不願意這麼去想。當然日後班禪發覺北京的「漢化政策」已經動搖了「藏傳佛教」的根基，於是他還是毅然地選擇了在日喀則市的扎什倫布寺自我圓寂的道路。或許他也遺憾，他作為階下囚的犧牲卻只能帶給北京對班禪十一世的指認控制罷。但是這可不就是那個不可說不可說的因緣聚合嗎？

大寶法王十七世的指認也有著相同的命運罷。我心裏非常清楚夏瑪巴多年來的苦心孤詣，但卻也不敢妄自猜測太錫度的居心叵測。或許太錫度也是抱著與班禪相同的「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菩薩心腸來牽制北京，藉以保存夏瑪巴在海外的白教傳承罷？當然這些都有待歷史學家日後的挖掘與研考。我身為一個拉薩僧人，衷心希望所有的人都不要搞分裂。不管怎樣，如今倆位噶瑪巴、太錫度與十五世夏瑪巴都不見了，這多少令我有如一個失去依憑的孤魂一般地徬徨了起來。

天下有山，山高天退。我繞著山頭走，不料卻在半山腰給迎進了隆德寺。我推拒不來，於是就這樣闖入了一個未知的陌生世界，在唯一的一間客房裏住了下來。寺廟相當荒廢，情況並沒有外表上看起來的興旺。我成天看不到人，吃飯時卻又見黑壓壓的一羣人。他們的衣著看起來不像喇嘛，舉止也不像喇嘛。他們說著各國語言，有英文、尼泊爾文、印度話、漢語，但就是沒有藏語。

廟中清閒，於是我在空曠的會客室裏找了一張凳子，開始撰寫這篇帶有自傳性質，又好像有點像交代後事般的小說。我想迴避閣樓生涯的描寫，但事實上不可能，畢竟三十年的歲月佔據了我人生的一大半。很遺憾的是，很多事我都想不起來，或是想起來也不覺得有甚麼值得記載的；很多時候，我又覺得我是在夢裏，或我希望這一切都是在夢裏。

在一些想不起開頭的事跡裏，我莫名其妙地想到了理查吉爾。理查吉爾現在好像也很老邁了，但是他那個風流倜儻的形貌在九〇年代可是迷死了許多美國好萊塢的美女。這個連想有點稀裏糊塗。我先想到了改變我後半生的「中印條約」締結，然後我自然地就開始埋怨印度。

印度這個國家的領導人一向不怎麼高明，所以老是沒有主見地跟在老東家英國的屁股後面，而英國與美國又是穿著同一條褲子過來的，所以印度也就馬首是瞻地配合著美國的全球策略對北京實施圍堵。這是九〇年代的國際形勢。現在大家有一些概念了吧？所以我說他們伸出援手收容達賴喇嘛，其實是「英、美」兩個西方大國在後面教唆授意。雖然這是一種推想與揣測，但我並不是全無根據，因此我始終認為印度的政治領袖都沒有甚麼深謀遠慮的見解。

他們沒有遠見本來也不打緊，但是這對西藏來說，就成了很遺憾的一件事，因為達賴喇嘛為了流亡在外的藏胞的生存，不得不順應著國際局勢，跟這些短視的政客打交道。這實在是一樁說不清、道不明的政治牽扯，跟達賴喇嘛在全球四處傳播佛理，原本就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

其實早在「中印」簽署條約的前一年，達賴喇嘛就已經警覺了。他心裏有說不出的憂煩，懊惱那個老當益壯的李登輝為了爭取第一次「臺灣總統全民選舉」的選票，不惜以「半官方」的形式訪問美國，來替自己造勢。李登輝這個行逕本來跟西藏沒有半點關係，但未料這個莽撞的舉動喚醒了神州大地上睡著的公雞。公雞睡醒了之後，發現牠不能老是一廂情願，等著別人來搶奪大陸廣大的市場，於是主動出擊，四處覓食，想盡一切方法來斲斷臺灣與西藏在海外搞分裂的野心。當然，「搞分裂」是北京政權的用辭，臺灣與西藏的說法不一樣；臺灣說他們要的是民主自由，西藏說他們要的是宗教

自由。反正弄了半天，這一東一西兩個邊陲之地所爭取的都是「自由」。你知道的，「自由」這東西正是北京所吝於給予的，於是矛盾就產生了。

不管怎樣，北京的這個舉動逼使得達賴喇嘛馬不停蹄地輾轉美國東西兩岸，然後由美洲轉澳洲轉歐洲轉北歐，到處不停地演講以喚起世界對西藏的重視。當然他每到一處，北京就立刻召集當地的大使訓誡一番，然後在記者招待會上對著一羣聽不懂中文的外國記者咆哮一陣。

說了半天，這跟理查吉爾有甚麼關連呢？我說嘛，瞧你，急的！甭急，甭急。日子長著呢。你聽我慢慢說來。嘿，嘿。達賴喇嘛的這些努力事後證明並沒有甚麼大用。看來這個定業要來，誰也擋不住。可不？像我這樣沒有多大福份的人天天在小閣樓裏作大禮拜，弄得胸脯、腹部、膝蓋與腳踝，沒有一處完好，但對「開悟」可也起不了一絲作用，於是我揉著疼痛的膝蓋就不禁埋怨理查吉爾。他太不爭氣了。達賴喇嘛責成他多盡一些力在好萊塢造勢，他本來幹得有聲有色，但想來仍抵不過業力牽扯，於是終於一個勁地栽進了女人堆裏，只剩下一些過氣的電影明星裝模作樣地在酒會裏吆喝著。

其實這麼說理查吉爾有點不太公平，因為當年他還是發揮了個人的魅力，四處邀集電影明星去遊說出錢的大老闆籌拍達賴喇嘛的生平事跡。這個功德不得了。於是大家都冀期著那兩部迪斯尼監製的達賴喇嘛傳記影片會對西藏造成一股起死回生的宣傳作用，但沒想到北京以不變應萬變，等著影片快拍成了，輕巧地又用著那套屢試不爽的市場誘因計策，逼使著迪斯尼的決策人員重新估量在大陸的投資。這一招還是厲害。雖然迪斯尼發動了一連串的輿論攻勢來強調遵循合約與履行法律責任對公司聲譽的重要，但是北京只給它來個相應不理。於是迪斯尼投資於大陸的億萬元生意在求救無門之下，幾乎動彈不得；他們無法可想，終於改弦更張，將合約轉手賣給三流的製片，粗製濫造一番，然後在全國影評的無情鞭韃之下，兩部影片草草上映，匆匆下片。

這樁糗事還在不明不白地進行的時候，長得跟理查吉爾有如孿生兄弟的柯林頓在香港「九七」大限的前題下，終於等不及一拖再拖的好萊塢戲碼，於是迫不得已邁出一大步與江澤民取得了協商。

其實柯林頓也是頭大得很。他從來沒有喜歡過江澤民，但又擔憂香港回歸中國後，這位掙扎於內鬥的國家軍政主席會老羞成怒地把美國在香港的利益犧牲掉。咳，咳。那個時候，江澤民老想利用美國以壯大自己在國內的鬥爭勢力，不料柯林頓幾年來只知道裝聾作啞，還批准他的死對頭李登輝到康乃爾大學演講。不管怎樣啦，柯林頓一同意造訪北京，印度立刻接受了江澤民的秋波而停止了四十多年來的長期交惡。這其實也沒甚麼大不了，但是他們如此一來，就開始有計劃地摧毀流亡的達賴喇嘛。

這真是說也說不清，不過這一切都在共產黨的掌控之中。如果你對「近代史」有些研究的話，你應該知道九〇年代的中國，因為興建長江三峽水壩幾乎耗盡北京的公帑。北京很為難，世界銀行在柯林頓的牽制之下，以水壩破壞環境生態為由，斷然拒絕貸款。沒有了貸款，北京在財政預算上捉襟見肘，於是發動民族感情，要沿岸各省支援三峽水壩的工程建設，沒想到中央這個方案卻引起東西部的省份反目成仇，幾乎鬧到兵戎相見的地步。

北京當然有一個高於一切的國家建設方略，而這個高瞻遠矚清楚三峽水壩牽涉到整個西南邊陲的安定與繁榮，所以非建不可，於是北京毅然地將四川省的重慶市升格為一個與北京市同等的國務院直轄市，藉以直截操作水壩的興建。這是一招高招。只是從此之後，共產黨在拉薩的宗教局對西藏的控制就更加嚴厲了。不料在持續的政治高壓下，他們非但不能減弱達賴喇嘛對西藏的影響力，反而愈禁止，宗教信仰愈日漸茁壯。當然囉，共產黨是不會放鬆的，於是趁著柯林頓計劃訪問北京的當兒，國務院釜底抽薪地對收容達賴喇嘛的印度撒下了漫天一面大網。

我先暫時在這兒打住，因為我知道你肯定有疑問，為甚麼我在那間小閣樓裏竟然有著這麼多的內幕資訊？我剛才說過的，三十年以來，我在小閣樓裏只有「解放日報」可閱讀。但是你可不要小看這份報紙，「解放日報」是一份共產黨在西藏自治區所辦的黨委機關報。當然我這麼一個逃亡的僧人是不可能看到這種報紙，但是你不要忘了，我姊姊的店舖租給了一家書店，所以來來往往的人都是些

舞文弄墨的搗蛋份子。這一來四面八方流傳進來的消息就多了，但是縱是如此，我還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透過層層的關係才弄到這些舊報紙。

雖然舊報紙沒有新聞的價值，不過在天長地久的閣樓裏，過時的新聞仍有著耐人尋味的雋永。那個時候的「解放日報」不像現在這麼厚，每天也就只有那麼幾頁，所以一整個月的報紙也不會造成閱讀上的壓力，更何況成月的報紙使得我很容易地在翻來覆去的查證中間找到前後矛盾的報導。我的判斷就是這麼前後推衍、而逐漸累積出來的。

說到這裏，我想我得說說為甚麼九〇年代的報紙只有兩、三頁。這個我想大家都還記得，那時共產黨多年來的「森林政策」執行不力，而且自然災害、圍湖開墾與山林開發將樹木都砍伐殆盡了，所以紙張老是不夠用；以前這個問題不嚴重，但是「改革開放」以後，紙張需求暴增，加上每年抽上煙癮的人老是超過「英、美」兩國輸入國內的香煙，於是捲煙草與濾嘴的紙張消耗就雪上加霜地使得原本尖銳的紙張需求呈直線上升之勢。國外以前也有紙張缺乏的問題，但是他們沒有那麼多癮君子，而且他們後來藉電腦網路來傳遞報紙，結果省下了大量紙張消耗。本來北京也打算這麼做，但是幾經折衝，終於因為國家的安全考量，對電腦網路遲遲不敢開放，於是中央為了節省紙張進口成本，就在三番兩次禁煙不成之後，不得不限制報紙的頁數。這點他們執行得很徹底，連黨報也一視同仁。當然後來北京一連串的驅趕「谷歌」、封鎖「臉書」，也就使得「互聯網」的監控技巧駕輕就熟起來了。這段歷史很有趣，但是太長了，而且牽涉到很多商業機密與解碼技巧，所以我就只交代到這裏。

我的回憶忽東忽西。突然我失聲地笑了起來，因為我記得我三十年來第一次下閣樓時，樓梯竟被我踩得左右搖擺，吱吱作響。笑聲嗡嗡地震撼著空曠的會客室。我被迴聲嚇了一大跳。大笑平息之後，我悵然若失，有點呆呆地不知所措。我有些難過，因為我稀稀鬆鬆地給小說開了個頭，忽然就接不下去了；我也有些釋然，因為我雖然有意地避開小閣樓三十年間的描述，但是卻很自然地將這一段

時間的生涯與大時代結合在一起。我不知道為甚麼我那麼害怕暴露我在小閣樓的生命，但我覺得這樣的「自覺意識」不足以構成小說的內容，而只是一種停留在某種時空的思維本身。現在檢視起來，我那時相當懼怕宣告自我的失落，所以我在揭示自己的生存境況時，無可自覺地受著執著的性格與悖時的心態所左右。這個缺失我始終無法覺察，但是不管怎樣，我總算起了頭。

「起了頭」是一樁偉大的突破。其震號號。我長長地吁了一口氣，然後滿意地拉開了門，跨出隆德寺。忽然閃進眼廉一片黃，無盡無止的野花，鮮黃地染遍整個山頭。我狂呼一聲，三步併兩步地奔走在「之」字形的小便道上，左一拐、右一彎地，直覺地感知了「變易」的原始意涵。

我一路往加德滿都走去，儘量躲著人羣，只有當山溝裏找不到食物的時候，我才到附近的村落內乞食。我總是在乞食的當兒順便打聽舊識的下落，但是大半時間我都在琢磨著我的小說。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在閣樓裏呆得太久了，所以回應起別人的話來都是木木佬佬地，但是每當想起自己的事兒卻又是思緒奔亂得有點控制不住。這點我簡直不知如何來改進。久而久之，我對自己的過去無可復加地依戀了起來，雖然我大多時候並不能認同自己的作為，但卻也無奈地追逐著過去，為每一個細節作下些許註腳。現在回想起來，我那時對過往經歷的一些痛苦與犧牲，彷彿有著事不關己的陌生與漠然；雖然我不明瞭自己的殘酷與冷漠，但是我卻清晰地感到恐怖與畏懼。

我經常都是餓著肚子。印度人雖然過得比以前富裕了許多，但卻也比以前吝嗇。我大半時候都吃不飽，所以夜宿山洞時就常瑟瑟地發抖。這個時候我就竭力地去思考我的小說，因為唯有如此，我才能夠止住我的饑餓感。

印度與尼泊爾的修行人沿途都是。不過他們好像比我想像中來得自尊自大，有那麼一、兩個，簡直可以說是頡頏傲世了。他們不相信我是個喇嘛，或曾經是個僧人；他們總是瞅著我，認為我欺世盜名。我私下暗忖：「這可怪了。在這個世道，我自稱是個喇嘛難道還有甚麼便宜可佔？」我並不想跟他們證明甚麼，所以常是不說一句話就走開。其實我跟他們寒喧，只是私心裏希望他們會看在同修

的份上多施捨給我一些食物，但是這些退隱山林的逸士宿儒卻把我的卑下認為是種心虛的膽怯。這種鄙視本來並沒多大關係，但是當他們拿著「奧義書」罵我是邪說異端時，我就禁不住怒目相對。當然打架是不曾打過的，我身體虛弱得很，要打肯定也打不過。

我沒想到我會遇見他，更沒想到還會有人對一個碩果僅存的喇嘛仍保有興趣；更妙的是，他給我帶來了一線希望，因為我雖然會漢語，但是我寫這篇小說形體的自傳時，堅持用「藏文」來寫。

我那時沒想那麼多，我也沒考慮到現在懂「藏文」的人已經快絕跡了。我只想替「藏文」留下些記錄，等個兩千年，或許會出現個語文專家替我們弄點考據。我得承認我是有那麼一點私心，希望能在我活著的時候發表這篇小說，讓世人對我這個最後的喇嘛保有一種懷念或只是對「喇嘛」保存著概念，但卻始終沒想過如何去發表。人家說人一老，思維就有些顛三倒四，我想並不是隨便亂說的。

他的出現掃除了我多日來的陰霾心境。就是在那飄雨的季節，我幾乎天天都在加德滿都街頭上徘徊，忽然就在波達拉大佛塔四周的流動人河裏，不意期地碰上了他。

「你到尼泊爾來作生意嗎？」

「作生意？」他哈哈一笑。「我這樣子像生意人嗎？」

我也跟著大笑。「那你不會是來觀光的吧？」

「也不是。」他瞅著眼打量著我。「我是來尋找老師的啦。」

「老師？甚麼老師？」

「嗯！跟你講大概沒關係罷？」他猶豫了一下。「我是『藏傳佛教』的白教弟子。」

「喔！『噶瑪噶舉』的！」

「是呀！」他興奮地說：「你也知道『噶瑪噶舉』啊？你從哪兒來的？」

「從隆德寺。」

「隆德寺？那你是太錫度的弟子？」他支吾地問。

「不。你應該說我是大寶法王的弟子。」

「是，是。是大寶法王。」他笑得極不自然。「隆德寺還興旺嗎？」

「挺好的。該做的都正做著。」我看得出他想躲避我；看來這三十年來，太錫度在北京的大力支持下並沒有建立良好的聲譽。

「那好，那好。」他轉過身子看著櫥窗內的傢俱擺設。倆人一時在街頭沉寂了下來。我暗自一笑，心想捉弄他一下：「那你怎麼不去隆德寺參訪一下？或許就能碰到你的老師？」

「不可能，不可能。我的老師不會在那兒。」他斬釘截鐵地說。

「你不去怎會知道？」我揶揄地問道。

他的眼神忽然充滿了憂懼。「對不起，我有事得先走一步。」

我見他轉身要走，於是止住了他，直截了當地說：「我也正在找十五世夏瑪巴。」

他睜大了眼睛，眼珠子泛出紅絲。「你不是太錫度的弟子？」

「我說過的，我是大寶法王的弟子，而且我曾是個喇嘛，祖普寺的。」我大聲地說。

「喇嘛？祖普寺的喇嘛？」他滿臉狐疑地喃喃自語，「祖普寺不也由太錫度接收了嗎？」不過他狐疑歸狐疑，當晚他還是邀請我住進了他在加德滿都鬧區租賃的小房間。

他是位從臺灣來的業餘華人作家，在遲司令揮動「人民解放軍」登陸臺灣的前夕，灰頭土臉地逃到了尼泊爾。他看起來比我還要老邁，但他說他只有六十歲。他會中文、台語、英語，還會藏文。我一聽大感興趣，妙的是他說夏瑪巴是他的皈依上師，所以他還懂一些粗淺的佛法。

這可妙了，我們竟然是「噶瑪噶舉」的師兄弟，而且還是夏瑪巴的弟子，最讓我欣慰的是，他聽說了我的小說，想將它翻譯為中文。我開心極了，我的故事終於可以在華人報紙上發表，但一聽他

說他的作品老遭到退稿，不禁又有了猶豫。我是可以在他身旁督促，以免他的翻譯出了紕漏。這不成問題。但我想他可能沒有甚麼福報，我這麼一個喇嘛跟他混在一起，可能會有不必要的牽扯。後來我也實在無法可想，所以也就只能隨緣了。對了，「隨緣」是漢人的說法，我們藏人從不這樣說的。

他說他的名字叫「林彬懋」。我算了算，這個奇奇怪怪的漢人名字有六個木頭，然後我按捺住一臉的好奇，把我的藏文名字說給他聽。他不耐煩地說：「這名字太長了，我記不得。」

我說：「無論如何你得勉強記下，將來小說發表的時候，你可以將它擺在你的名字旁邊，以免別人誤以為你就是那個喇嘛。」他笑笑，不置可否。

我看著他莫測高深的笑容，弄不清楚他是否記住了我的名字。不過當你讀到這篇文字的時候，如果僅看到他一個人的署名，那就是表示他還是沒能記住。但不管怎樣，我是個學佛之人，我不願去猜想他有偷盜這篇文字的心思；就算真是，他必有他的苦衷，我生來就具慈悲心也不去與他計較。

或許他真是出自一片善意，好心替我隱藏我三十多年來未被識破的行蹤。在這裏，我要慎重地對那些喜歡以法律維持社會秩序的人預先提出書面聲明，我不願在版權上多加追究。不過讀小說的人一定要有體認，他不是我，我也不一定就是他。我是個來自拉薩的喇嘛，他只是個流落尼泊爾街頭的作家，喏，二流的，因為他寫的東西老登不出來。

我交代完整篇小說後，忽然全身像散了架似地沒勁。這時初秋已經來臨了，加德滿都有著宜人的午後。「走吧！上街去吧！」他總是在下午三點左右邀我同行。於是我們併肩由他租賃的小房間走出來，沿著街道四處逛著，打聽著，等待著與夏瑪巴不期而遇。

有時我很厭煩這種無可期待的找尋，於是強迫他開始逐字翻譯我的小說。他卻是不情願地找著各種理由拖延。「你到底有甚麼毛病？」我沒好氣地問他。

他悶悶不樂。「我經常夢見夏瑪巴老師，他正呼喚著我。我不想分心來做其他的事兒……夏瑪巴看著我感到很失望……我看著他的失望表情，有點不知所措……」他的嘴角下撇，十分喪氣。

我很想對他說，我打算去找別人翻譯了。「我要留下我作為最後一個喇嘛的記錄。」我使勁地搖撼著他的肩膀。「聽懂沒有？最後一個喇嘛！『拉薩的最後一個喇嘛』！」

他不理我，仍是撇著嘴。我拿他沒辦法就大聲地吼道：「你不是個喇嘛，所以你不會知道這個重要性。」我一邊哇啦哇啦地大吼著，一邊抓起稿子，捲起鋪蓋，躲至牆角。我這樣有點失去理智地大叫，或許只是想向他顯示我做個喇嘛的最後尊嚴，更或許我要對他宣告我對「藏文」的流失有著比常人更加哀傷的憂慮，但是我們之間除了同是夏瑪巴的弟子以外，沒有任何共同的信念，我們也無法在相同的回憶中生活，於是這就造成了我們中間的隔閡——生活上的，不是宗教上的。

吵完架第二天，我想離開他那兒。我思考了一整夜，終於想通了，「喇嘛」的時代已經告結，寫不寫自傳其實沒多大關係。我雖然惋惜，但也無可奈何。有一天人們將不再知道「喇嘛」曾經存在過。這就像任何一件事物一樣，時間一久都將沉淪或湮沒在沉默之中，「恐龍」或「喇嘛」均如是。

我走近他，從他肩頭後面瞧見他扶案在飯桌前讀著我的稿子。我有些詫異，他忽然抬起頭說：「昨夜我夢見我自己成了一個喇嘛。」他輕佻地說：「不過他們不叫我們喇嘛……」

「他們是誰？」我打斷他的話。

「不知道，一大堆講著一些沒有人聽得懂的『人民解放軍』。」他又回轉頭去，「你知道的，臺灣這些年，『台語文字化』早已落實，『文化中國』的概念隨著『正體字』書籍的消泯也久已不在小島上存在了，而以前那些只認識『簡化字』的臺灣人更早就習慣『台文』的書寫了。」

我的臉上毫無表情，但是沒有絲毫不悅。「那他們稱呼我們甚麼？」

「好像是『恐龍』罷。我聽不清楚。」他挑了挑那已顯下垂的浮腫眼皮。「我只記得他們一直逼問我夏瑪巴的下落。我說不知道，他們不信。他們說既然你不知道，為甚麼還在加德滿都瞎找？我說這真是奇怪，你們怎麼老是開不了竅？我就是因為不知道，所以才在加德滿都的街頭上碰運氣。」

他嘻皮賴臉地說：「你知道的，我在夢裏的膽子一向很大，但我真正想說的是這麼一個以『正體字』呈現的『最後一個喇嘛』的故事對只懂『台文』的臺灣人來說，其實沒有任何意義。」

「你這是甚麼怪夢？」

他不理我。「我心裏終於明白了，但我不屑告訴他們……」他閉起雙眼。「夏瑪巴從來都不曾離開過。我不知道是他在找我們，還是我們在找他……」

他說完這話，就開始細心讀起我的稿子。我忽然之間有著無比的感動，於是把準備要離開的話吞了回去。對我來說，這番似夢似真的對話是個象徵。它象徵著我們終於有了一個共通的語言，原來它可以是漢語、台語，也可以是藏語。這個象徵是我從第一次在街頭邂逅他時就一直有的期盼。

從這一天開始，我又有了一次覺醒。原來佛教之所以會傳遍歐美各國是因為西藏人反抗共產黨對宗教的壓迫而流亡到印度才得以廣為傳播。我從前在閣樓裏，老是認為這些流亡的人的確像共產黨說的棄家背祖；現在我明白了，只有我們離開拉薩愈遠，佛陀的教誨才愈能留存在人類的思維深處。在古老的拉薩寺院中，佛堂雖然奧妙，佛像雖然精細，佛器雖然珍貴，圖繪雖然亮麗，但是隨著這些寶物的消失、毀壞或丟棄，佛法終將重新獲得鮮明的涵義。如今「拉薩的喇嘛」將成為一個只存在於人們思維中的遙遠記憶，但是他們將通過世世代代的傳承，在相續的時序裏重新獲得自己的覺醒，在多重的世間中持續廣佈自己的慈悲。這點，我想就算已經復甦與增生的苯教也是壓抑不住的。

這天，我放下他潤飾的稿子看著他，眼裏有了嘉許。他笑了笑：「這是我在這個世俗的人間所要做的最後一件事了。」他傷感地說：「臺灣我是回不去了。我反正也沒甚麼重要的事兒可做，所以你可以放心，我會竭力做好這件事。」我看他說這話的時候很淒清，於是想邀他結伴同行，但是忽然我發覺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哪兒，只好作罷。我一直陪伴他，直至他將我們在加德滿都的邂逅經過翻譯了出來以後才離開。當然這些都是我將他的「台語」翻譯再重新翻譯為「正體字」的文稿。

我隨手就把手稿留給了他。現在我真的不在乎那些「他是不是我或我是不是他」的種種無聊的問題，而且我已找到人類的共通語言了，所以反而不覺得有甚麼理由非得將「藏文」留傳下來。這個思想轉變令這篇自傳小說的發表變得可有可無，也令我當初的出走變得好似事不關己地無關緊要。

我告別他後，一路往拉薩方向走去。我想回祖普寺，但是我愈往北走，天氣愈冷。這也難怪，已經是初冬了。我意外地發覺我愈來愈吃得少，所以反而沒有來的時候饑餓，但是我逐漸地有點抵擋不住嚴寒的侵襲了。現在遠處的山頂一片白茫茫地，可能回去的路已經被大雪封住了。

我終於又回到了隆德寺，但是我沒進去；我只繞過山頭，躲在洞窟裏。天氣愈來愈冷，我逐漸沒有了思維。我有時餓得沒有力氣，只能無意識地將心頭的臆想落在皚皚的喜馬拉雅山頂，幻想著有那麼一、兩塊怪石聳立出白雪的覆蓋，猶若我茫無著落的心頭掃描在亙古的痕跡裏。

冷喲。這下可怎麼得了？我可能回不去了。我日益浮腫的雙腿已經逐漸不聽使喚。管它咧！我心想，反正拉薩已經沒有正統意義的「喇嘛」了；回去了，還不是一樣得窩在書店的閣樓，望著窗外百貨大樓的金光玻璃閃爍出來拉薩新主人的貪婪。

我往上望著，近處的山洞裏彷彿仍留著密勒日巴修行的蹤影；向下看去，山谷與平原裏卻鋪滿著無數跟隨者的足跡。我來回望了多次，終於有若吐出一口瘀痰般地哈哈大笑，然後我離開了洞窟，放下了內在的暗礁，一逕踏上山後那條奔往無盡頭的褐黃卵石子路。

小石頭一塊又一塊，我腳下一高一低。走著走著，我不覺踏上了鋪滿白雪的甬道；隨著腳步，身上不知怎麼搞地彷彿暖和了起來。此時滿頭雪花花的白髮隨著風向後吹捲，慌慌張張地掉落在白茫白茫的雪地上；銀絲銀絲的細髮四處散置著，大雪隨即迅速覆蓋了上來。銀白的頭髮就這樣不見了，但是倘若你仔細地瞅去，你仍然可以從白雪中分辨出來……